

顾炎武:开启清代朴学思潮第一人

张 敏¹ 李海生²

(上海行政学院,上海 200233)

摘 要: 清初,朴学取代理学成为学坛主流,顾炎武是开启这一思潮的先导大师,他标帜“行己有耻”、“博学于文”,把为人为学统一起来,具备了充任学坛领军人物的素质;他站在时代潮流的最前沿,政治上反抗异族统治,思想上高扬反理学大旗,敢为天下先;他引领经学走出哲学化域地,力开朴实学风;他奠定了朴学的学问基础,影响卓著,光照后人,被后世公认为是“清初三大儒”中奠定清代朴学思潮的第一人。

关键词: 顾炎武;朴学;理学;经学

清初,朴学思潮应运崛起,如晨曦破晓。然其临近味爽,沉沉夜空中已见群星灿烂,最亮的一颗当属顾炎武。乾隆年间,朴学昌盛,学者汪中瞻前思今,纵论功过,确认“古学之兴”,“顾氏始其端”也^①。后来,梁启超补叙遗论,臧否人物,坚信“当此反动期而从事于‘黎明运动’者,则昆山顾炎武其第一人也”^②,给予了很高的评价。差不多同时代的支伟成作《清代朴学大师列传》,亦发现“清初学者虽不若乾嘉诸师之家法完密,然而筭路蓝缕,开三百年来治学涂术,厥功伟矣。亭林在诸先生中尤称贯通博瞻,纵未专一经,实集众之大成”。因而“清代朴学之风,悉自先生(顾炎武)启之”^③。

一、站在时代潮流的最前沿

作为一“时代思潮”的领军人物,首先应具

备卓而不群的个人素质,尤其在破坏旧世界、创造新世界的历史转折时期,缺乏了高风亮节,非凡的智勇和学识,不足以摧故锋而张新军。因为品高服众,万人景仰;智勇生胆魄,敢于向旧势力峻露霜刃;学识去蒙昧,开启新思想,集合起来,便可站在风云际会的前沿,以特有的禀赋催发生命,以团队领袖的雄姿,登高疾呼,唤起蓬勃的运动气势。这一点,顾炎武比其他同仁做得都好,他把“行己有耻”悬为做人的标帜,身体力行;他把“博学于文”当作为学的基石,真正使为人与为学统一起来,梁启超称他“不但是经师,而且是人师”^④,表达了深深的敬意。

衡量一个人的历史地位,大处看他与时代的关系。

清初风云激荡,时代主题十分鲜明。政治上:反抗异族统治、救亡以图存;思想上:清算道学先生、拨乱以反正。顾炎武直面两条战线的

收稿日期:2001-12-19

作者简介:1. 张 敏(1962.9-),女,河南人,上海行政学院助理研究员。

2. 李海生(1952.1-),男,河北人,上海行政学院副研究员。

斗争,义无反顾地站到了短兵相接的第一线。

顾炎武出身于江东望族,家道兴衰与大明王朝的沉浮相齐,每况愈下。到了炎武这一辈,窘困交织,几于平民无二,惟独书香气息不绝,诵经明志的古训,牢牢扎在心头。清兵入关后,明统绝亡的噩耗传来,令炎武心中震颤,悲情大作,慨然挥毫,“秘讖归新野,群心望有仍”的诗句跃然纸上,表达了匡复故国的决心,并且改名“绛”为“炎武”。据沈嘉荣《顾炎武》一书解释,根由在于仰慕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学生王炎午。自此,亭林走出书斋,毅然决然地投身到了抗清斗争的行列之中。康熙二十二年正月九日,顾炎武病逝于曲沃,终年70岁。他的后半生,高扬民族大旗,以气节感人,无愧为“国魂脊梁”四字。钱穆将炎武与清初三大学中的另两位相比,称“梨洲晚节多可讥”;“船山于诸家中最晦”,唯“亭林最坚卓”^⑤。

再看思想战线上的新旧交锋,炎武也是最有建树、最具杀伤力的志士。他对王学末流的批判,严正而又深入,超过了同时代的其他人,略作概括,拟归纳三点贡献:其一,拨理学之乱,视陆王心学为鹄的,反对主观的学问,力行客观的学问,把以夏峰、梨洲等为代表的修正路线,提升至否定旧思潮的高度,展现了王学革命家的风范。其二,提出“理学即经学”的著名论断,匡经学之正,纠理学之偏,为新思潮的破罅而出,矗立了航标,疏通了河道。这相对于毁兴十足的全盘否定路线,显得特有建树。其三,强调“通经致用”,恢复道统,尽心为政治而做学问,故亭林之学尤具感召力。梁启超洞观气象,颇有一番评价,认为“清初大师,如夏峰、梨洲、二曲辈,纯为明学余波;如船山、舜水虽有反明学的倾向,而未有所新建设,或新建设未能影响社会”。亭林则不然,他“一面指斥纯主观的王学不足为学问,一面指点出客观方面许多学问途径来”,使得“学界空气一变”,乃至以后的二三十年也“跟着他所带的路走去”^⑥。

总之,在回应时代主题的运动中,炎武领风气、顺形势,一马当先地站在了历史潮流的最前沿。

二、引领经学走出哲学化境地

理学的革命性意义,在于它使传统的经学(汉学)终止了偏重经世、还是典籍的龃龉,营造一个脱坯于神学框架而生的哲学化时代。尽管宋儒、明儒各有所好,一个强调义理在外,一个强调义理在内;一个推崇超感性的抽象本体,一个推崇超感性的先验本体,描摹出理学与心学的分野,但本质上都是主观的学问。

主观的学问未必是哲学,哲学却一定是主观的学问。通俗地讲,哲学即关于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学问,形而上是它的基本属性。以此观照理学,不难发现:“宋人重点讲四书,《论语》《孟子》提供心性论的资源,《大学》《中庸》则有抽象的世界观涵义,《易》也在后一意义上被强调”^⑦。明儒创心学,也是本体之学。纵观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,“至少存在三种类型的本体论。第一种,分析宇宙万物的构成要素,属自然哲学,或称宇宙论。第二种,确定宇宙社会的抽象运动规则(包括人伦物理),依强调重点而趋归于自然或社会哲学,前者仍属宇宙论,后者则为广义的伦理学。第三种,指点生命意义或发掘价值源泉,系人生论,属广义的宗教哲学”。在宋明经学中,本体论的内容最为丰富,上述三型各有体现,即“气本论、理本论与心本论”,而张载、程朱、陆王则分别是“三种立论的代表”^⑧。

理学至明代,侧重点内移,“师心自用”的标榜,利弊参半。一方面,道德自觉的创意,使人精神解放,所谓精神在外,至死地劳攘,须收拾作主宰。精神在内,当恻隐即恻隐,当羞恶即羞恶,由心而生,随心而发,自主自由。另一方面,又不能确保任何个人的体验,都合乎纯粹的道德规格、而不属私意的玩味。于是,修身的意境变数大增,事事以感悟体会为主,不讲行动、实验、印证;“尊德性”流为虚拟设定,以致无法厘清自觉与随意的区别,使心学内律松弛、消极面泛滥,最终堕为空洞无用的说教。这样一来,形而上化经学也走到了尽头。

清代朴学取代理学,另辟道路,把陷于困局

中的经学拯救出来。首先,治学的前提与归宿发生了变化,一个从主观的原则出发,通过演绎推断“公理”;一个从客观的原则出发,通过考证,回归元典;言心言性与阙疑信古的分野极其鲜明。其次,治学的方式发生了变化,阐发式的解经被考据式的证经取代;哲学化的思考让位于历史学的审视,实事求是成为大节。这样一来,客观的学问取代主观的学问,反成主流,进而引领经学走出哲学化域地。

其实,批评学问向内的声音,在宋明两朝已有所闻,明代中叶以后,逐渐增强。但真正发端于新旧交替时期、对学术转换起到关键作用的,当在清初,顾炎武的贡献尤为突出。

顾炎武甄别学问,先行确立是非标准,他说:“不习六艺之文,不考百王之典,不综当代之务,举夫子论学、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,而曰一贯,曰无言。”^⑧意思是说,离开了经书典籍、周孔大端以及当朝的实际,都不算真正的学问,直接否定了宋明学术存在的价值。随即,他又提出了“鄙俗学而求六经,舍春华而食秋实”,以“务本原之学”的改造方向^⑨,主张学术回归元典,用具体的、客观的学问取代抽象的、主观的学问。

既然是客观的学问,那么就应该将宋明学术倒过来做:改向内的路线为向外;去“宁道孔圣误,违言程朱非”、“违言陆王非”的态度为“信古而阙疑”;变“六经注我”的解经方式为“六经皆史”;从而把沉湎于哲学化的思想恣肆、扭转到用事实说话的历史学审视上来。这一方面,顾炎武有所作为,且不乏建树。

“实事求是”是顾炎武的治学原则,也是认识的客观性原则。从这条原则出发,考经证史,应据事直书,尽量做得客观公正,不加主观臆测。为此,亭林批评道学先生,为学好“师心妄作”,不重先儒“据依”,“刊传记未已也,进而议圣经”;“更章句未已也,进而改文字”^⑩,弄得学问根基稀松,面目失真,不成体统。若要拨乱反正,必先背其道而行之,用“大公无私”的精神去改造学风,这里的“公”,乃客观公道;“私”乃个人意志,用今天的话来说,也就是尊重历史、尊重事实,反对主观主义。在顾炎武看来,经是古

人的作品,真伪应以元典为绳墨。当年,孔子珍惜经的原貌,以免流传时失真,故不敢妄加穿凿,并提出了“信而好古”、“述而不作”的治学主张,这就是不以“私心待圣人”。孟子也说:“其文则史”。史者,过去之事,不独《春秋》,虽六经皆然;据史直书,还历史真面目也。因此,标帜大公无私,便能去伪存真,回归元典。有学者进一步断论,认为朴学后进章学诚的“六经皆史”说,就是“从顾炎武的主张中获取了有益的启示”^⑪。

为了把客观的学问做得中规中矩,顾炎武竭力提倡奉行“信古而阙疑”的治学态度,他说:“五经得于秦火之余,其中固不能无错误,学者不幸而生乎二千余载以后,信古而阙疑乃其分也。”所谓“信古”,即尊重历史;所谓“阙疑”,即不人云亦云,着重依据;合起来也就是被后世朴学家奉为根本的信条,即“实事求是,无征不信”。

与此同时,为“阙疑”澄清有效,顾炎武还确立了相应的方法论原则,钱穆概括为两条,即“语必博证,证必多例”^⑫。“博”者以表“孤证不为定说”;“多例”也就是“罗列事项之同类者”,用来作“比较的研究”,从中“求得公则”^⑬。这样一来,归纳法就被大量地采用,并且成为后世朴学家们的“最要法门”之一。其实,这也是形上化经学向实证经学转化时的一个自然选择。前者据理玄思,虚辩的成分居多,演绎足以推论;后者据史说法,证实是大节,不举例,无博证,难以取信,归纳法必在其中矣。

可见,在引领经学走出哲学化域地的行程中,顾炎武出手确实不俗,并且作出了巨大的贡献。

三、奠定了朴学的学问基础

顾炎武奠定清代朴学的学问基础,主要从两个方面体现:其一,“在他做学问的种类,替后人开出路来”;其二,“在他做学问的方法,给后人许多模范”^⑭。

与历史上的其他时期比较,清代朴学所涉及的学科门类是最多的,即以经学为中心,衍及

史学、音韵学、文字学、天算、地理、金石、典章制度、校勘、辑佚等等,而其中的大多数门类,均发端于顾炎武,可以这样说,清初学坛像亭林这般学识渊博、学术作业面极为广泛的大师,是独一无二的。故梁启超称亭林,若论著述“专精完整,自然比不上后人。若论方面之多,气象规模之大,则乾嘉诸老,恐无人能出其右。要而论之,清代许多学术,都由亭林发其端,而后人衍其绪”^⑧。以往,有人把毕其生专一经的乾嘉学者语为“半个亭林”,多半也是从逊色于学术广度来指认的。

朴学发皇之前,传统学术的大头在经学,尤其是掺杂了统治权力营造主流意识的成分以后,其他的学术门类,很难有单独发展的空间。因此,长时间里,传统学术重门派之异,轻门类之别,并以纵向的传承弱化了横向的类分。这种状况直到清代才有改观。顾炎武是率先身体力行的一员,他于经学、史学、音韵学、文字学、金石考古、天象历算、舆地兵事等各个方面,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。

顾炎武一生所著甚丰,其半生游历,也没有丝毫耽搁。康熙二十一年(1682年),顾炎武病逝于陕西曲沃,堂弟顾岩从江南来,收拾遗稿,捎往北京,交徐乾学、徐文元处理,据说这两位身居高官的外甥,对舅父的文字并不怎么重视,致使其中的一部分散失,现有书目可考实的为61种,其间存疑者7种,文本散失者16种,由中华书局、商务印书馆、北京与上海的古籍出版社等重新整理发行的有13种。即便如此,也可管窥亭林之学,汇百家于一身。

《日知录》是顾炎武的代表作。最早有符山堂原刻(八卷)本,乾隆六十年重刊,末附《日知录之余》二卷,同治十年湖北崇文书局再刊《日知录集释本》,附刊误二卷与续刊误二卷。1985年,上海古籍出版社刊印《日知录》三十二卷本。顾炎武自称:《日知录》可为三大部分,即“上篇经术,中篇治道,下篇博文”,他的弟子潘耒在为《日知录》作序时,按学术门类,归为八个方面,即经义、史学、官方、吏治、财赋、典礼、舆地、艺文;乾隆年,朝廷修《四库全书》,将其分得更细,列经义、政事、世风、礼制、科举、艺文、杂论、真

妄、注书、兵书、外国、天象、术数、地理等15个门类。综观分陈细化的趋势,反映了轻分科现象的扭转,但本质上还是《日知录》本身的内涵丰富,具有体例多样、体制恢弘、百家诸科无不爬梳的特征。有学者将此书与杜佑、郑樵、马端临的“三通”(《通典》《通志》《文献通考》)相比,认为在大的“学术架式”之下,无论是深度广度,还是学术上的“创造”,都超过了古人的成就^⑨。梁启超认为,“大抵亭林所有学问心得,都在这书中见其梗概。每门类所论的话,都给后人开分科研究的途径”^⑩。

《音学五书》是顾炎武专攻音韵学的著作,由《唐正韵》《诗本韵》《易音》《音论》《古音表》五个部分组成。据史所载,最早有康熙六年符山堂刻本、皇清经解十四卷本;光绪朝虽也有多种刻本问世,但所录俱不全,或收《古音表》或收《音论》不等。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完整的《音学五书》三十八卷本。书中,顾炎武先从发现问题入手,譬如按今音诵经,凡不协和处,可能就存在读法上的差异。随后再逆时序地追溯,从源头考起,为此,顾炎武差不多梳整了1900多个韵脚,发现了上自秦汉魏晋,再至齐梁唐宋的声韵衍变规律,每个时段自成体系,且又相互交叉,另有异同。其时,他还在综合前人成果的基础上,对古声韵的归类重新编排,将原来的206个小韵脚,划并为10个大的韵脚,一举奠定了清代音韵学的学术框架。梁启超称:“清儒多嗜音韵学,而且研究成绩极优良,大半由亭林提倡出来。”^⑪清代中末期,音韵学著述不绝,有江永的13部、段玉裁的17部、孔广森的18部、王念孙的21部,直至章太炎、黄侃师徒的23部,逐节把古声韵的研究推向深入,但论及原始摹本,“无人不把开辟的功劳归到顾炎武的身上”^⑫。

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《肇域志》是顾炎武青年时代开始上心的著作,从收集资料到汇总成卷,前后花了20余年的时间。1662年10月,顾炎武游历至山西太原,将林林总总的积累汇合整理,分成两截:一部分以偏重历史地理为主,取书名为《肇域志》;一部分以偏重生民利病为主,取书名为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。《肇域志》的抄本

有好几种,但聚集起来也未臻完全。据《胡培系杂著·清校刊顾亭林先生郡国利病书议》称:“《肇域志》原稿,曩在浙江许周生驾部宗颜家。咸丰乙卯培系曾为前署两浙盐运使缪武烈公梓校,钞一副本。庚申粤匪窜扰,武烈殉难,书亦被毁。”现今所见者,主要是上海图书馆珍藏的汪士铎钞本 50 册,以及四川省图书馆珍藏的清钞本 40 册,均有残缺。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虽由顾岩从曲沃带往北京,完整地交给二徐(徐乾学、徐文元)。后来辗转流落到校勘家黄丕烈手中,重新编排刻印。1936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“四部丛书三编本”,就是黄氏的版本。其间,别样的刻本也不少,或有增补,或有妄改,大多不是原汁原味。

《肇域志》顾名思义,便知是一部地理学著作,专叙地域形势的沿革,涉及浙江、山东、山西、河南、湖广、陕西、云南、贵州、广东、福建等省。每篇的末尾,还兼述时事、漕耗、防备倭寇的内容。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的内容稍许丰富一些,张元济在为此书作跋时,有过一段概括的表述,认为:“亭林婴亡国之痛,所言万端,而其所再三致意者不过数事,曰兵防、曰赋役、曰水利而已”^②。兵防事涉及屯田、战略、战术、战器、功防、驻守、给养等;赋役事涉及赋税、差役、田制等;水利事涉及灌溉、河运、海运等。梁启超称上述两部书“愿力宏伟、规模博大。后来治掌故学、地理学者,多数感受他的精神”^③。

在顾炎武的著作中,考史作史类的不少,除却前文论及的几部外,还有《明季实录》《营平二州史事》《山东考古录》《圣安本纪》《京东考古录》《健康古今记事》,以及散失的《二十一史年表》《北平古今记》《万岁山考》,包括只见存目的《重修宋史》等等。时域跨度大,上至秦汉,下抵元明,覆盖南北。且类别体例丰富,有史考、史论、杂史、历史地理;有纪年体、记事体、列传体等等。虽不为独创,但以一人之力,开百端气象,着实令人钦佩。

《金石文字记》六卷,是顾炎武的又一部重要著作,被后世学者归入史部金石类,梁启超认为:“清代金石学大昌,亦亭林为嚆矢”^④,《金石文字记》乃奠基之作。

梁启超在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中,曾对清代朴学的学术门类列举要者,说了 13 个方面:一、经书的笺释;二、史料之搜补与鉴别;三、辨伪书;四、辑佚书;五、校勘;六、文字训诂;七、音韵;八、算学;九、地理;十、金石;十一、方志编纂;十二、类书编纂;十三、丛书校刻。除了极个别的门类,顾炎武均有涉及,并以其先行独立的创设,鹤立于清初学坛,这在当时,无人能望其项背。

再就是做学问的方法,为后人垂范。顾氏弟子潘耒概括为“反复参考”、“援古证今”。梁启超一言蔽之,所谓“以抄书为著书”^⑤。这当然不是无所用心地抄,而是淘金般地沙砾中寻觅珍宝,故量的方面,“要求丰备”;质的方面,“要求确实”^⑥,不得真相不罢休。钱穆“撮要而言”,整理出两条:“为种种材料分析时代先后,而辨其流变,一也”;“每下一说,必博求佐证,以资共信,二也”^⑦。他们简括地说了大节。另外,涉及具体的门类,还须有具体的方法,比如治音韵学,考一字的读法,列本证、旁证二条;二条俱无,则宛转以审其音,参伍以谐其韵的方法。又如训经重视经史贯通、互证的方法;引证佐,明流变,躬实察,辩真伪的方法。再如考史“审源流”,“辩真伪”,“明正误”,“辩疑义”,“钩沉潜”,“阐幽微”;作史“广辑资料”,“秉笔直书”,“慎作论断”的方法等等^⑧,都对后来的朴学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

四、影响卓著 光照后人

黄宗羲、顾炎武、王夫之被后人并称为“清初三大家”,这不仅在于他们的学问出类拔萃,还在于他们对后起的朴学思潮影响卓著。

朴学思潮从顺康开山到乾嘉昌兴,不足百年。其间,王夫之由于僻居隔世,著述不能为中原儒林见识,从而极大地阻滞了他对清初学界的影响。黄宗羲虽然声名遐迩,但居处江南,不思北渡,这在传媒尚不发达的当时,也削弱了梨洲之学的传播广度。唯炎武出行,半生游历,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,且与各地的鸿儒名士频频交往,诸如归庄、万寿祺、潘耒、张昭、张尔歧、

孙奇逢、李颀、徐夜、傅山、屈大均、阎若璩、杨瑀、朱彝尊、刘孔怀、吴任臣、李因笃、申涵光等等,差不多囊括了南北各派的名流,使其学问普现天下,故影响面也较黄、王二人更宽更广。

以往评价明季遗儒的开山之功,向有“经学之祖”(顾炎武)和“史学之祖”(黄宗羲)的誉称,但仔细斟酌下来,各擅胜场之外,也有轻重。首先就学术的基本倾向而言,顾炎武与王学反目,主张以经学取代理学,是坚决的革命者;黄宗羲则犹抱琵琶半遮脸,一方面对王学末流的垢迹竭力清除,另一方面又与王学有着割不断的师承源溯。两人同样意欲告别旧时代,顾炎武因其不怕割舍,而大有卸下包袱、轻装前进的决心,一旦摆脱干净,便绝尘疾去;黄宗羲因其无从割舍,而显得缠绵悱恻,但凡刺得深入,犹觉心痛,故行走起来较亭林沉滞,难以及远。他的弟子万斯同赴京入史局,师友相送,专嘱勿“入室操戈”,意思是说,莫以文字伤了王学宗师王阳明(王乃浙东人)。全谢山在《鮚埼亭集·答问学术帖》中也有一段话说得精彩,认为“先生(指黄宗羲)之不免余议者,则有二:其一则党人之习气未尽,盖少年即入社会,门户之见,深入而不可猝去”;其二,“则文人之习气未尽”,不免“以正谊明道之余技,犹留连于枝叶”。梁启超称:“这段话把梨洲的短处”,“说得公平”,他既有“清代学者的精神”,又“不脱明代学者的面目”^⑧。这样一来,同样应对时势,在引领反理学潮流的行程中,亭林要比梨洲更具锐气。

其次,就学问道路的开拓而言,顾炎武的成就也较黄宗羲略微出彩,特别在学术创新与史学研究方面多有贡献。顾炎武以“经学之祖”享誉后世,最主要的功绩是把考史明经与训经证史合为一体,开创了经史贯通互证的学术路线,一下子把高居庙堂的形上化经学贬低,与史比肩而行,宋明学问的主观色彩终于消失,其后,章学诚在《文史通义》中标榜“六经皆史”,延续顾氏治经的路线,为朴学发展标明了方向。

在音韵学方面,顾炎武以“读九经自考文始,考文自知音始”的研究顺序,确立了音韵学的特殊地位,并且引导后来者,多以治音韵为源头,由文字训诂进入考经领域。清末名臣张之

洞在《书目问答·姓名略》中说:“由小学入经,其经学可信。”意思是说,一个人的音韵学、文字学功夫扎实了,训经的本领自然高明。张氏说这段话时,朴学业已式微,但炎武开创的治经方式,依然受到了推崇。当然,还可以看得大些。回顾早先的训诂学,多在字的形义上下工夫,炎武率先把音形的研究捏合在一起,非但丰富了训诂学的内容,而且促使整体的研究水平更上层楼。

在史学研究方面,顾炎武主张“论从史出”,把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方法贯通于历史考据的全部过程。与此同时,为了避免唯史料至上的纯客观主义弊端,炎武又主张援古证今的理念,作为史学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。他说:“史书之作,鉴往所以训今”^⑨,故“引古筹今,亦吾儒经世之用”^⑩。虽然,后来的朴学学者,多重考据治史,不出格局,认为有一分凭证,说一分话,没有全盘继承顾氏的治学风格。但其“以经证史”、“考史辨妄”、“作史以信”的基本原则,并没有走样。以往,论及“清代史学开山,学者皆知有黄梨洲,而不知有顾亭林,论亭林史学成就,学者皆知有历史考据,而不知其历史哲学。其实,顾炎武不仅以经史考证开创了乾嘉历史考据学派,而且其考史辨妄、以信作史中寓引古筹今之历史哲学,从而对清代的经世史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”^⑪。

其他的方面,顾炎武广有涉猎,但其求索形散神聚,均以治经为宗。在这个前提下,他把小学、天文、历算、舆地等诸多学科统统纳入与治经相关的轨道,并将崇尚客观的治经方法贯通其中、融合为一,进而提升了杂学的学术档次,使之成为主流学术中的一个分支。否则,这些“雕虫小技”不可能在清代得以发扬光大。

显见,顾、黄二人虽同开朴学先河,各有所长,但总体衡量下来,无论学问,还是为人,顾炎武尤可圈点,这也决定了他对后世的影响,盖过梨洲,成为启朴学思潮、开“黎明运动”的“第一人”。

注释:

